

## 分工与产业结构发展

# 第10章 结束语

### 10.1 基本观点与结论

本书在对产业结构发展特别是从制造经济迈向服务经济阶段的转型过程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和结论：

首先，本书在承认以人均收入水平为代表的最终需求因素会在一个比较宽泛的阶段范围内对产业结构转型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同时，强调和总结了收入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并不具有稳定而显著的线性推动作用，而中间需求因素是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次，本书在对发达国家从制造经济迈向服务经济阶段转型过程的经验实证研究中发现，代表着中间需求性质的生产服务业的增长是这个时期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进一步肯定了在这个转型阶段中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是更为重要而关键的影响因素这一理论逻辑。

第三，本书认为从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出发去研究服务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更好地表现出产业结构中各个产业互相关联和互动的过程和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使得结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可以从制造经济本身出发，去寻找其内生地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第四，在对工业产业分工影响服务经济发展的分析中，本书论述了工业产业会通过内涵式的分工深化和演进，促使中间服务需求的

扩张,这是从制造经济中内生地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根本机制和原理。而在其间,影响分工状态形成的各种因素也会对服务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它具体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企业内部活动的分工深化、细化,会刺激相应的网络控制性中间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形成企业内部服务人员(活动)相对于制造人员(活动)的扩张,这形成了服务业从制造企业或产业中分工分离并不断向外扩张的根本基础,这种机制同样发生在产业链层面上。在内涵式分工发展的基础上,企业的组织结构性分工会将制造活动和服务活动的分工现实性地转化为社会劳动分工,使得制造经济内部推动服务业发展这一机制得以外在地实现。这具体表现在企业内部服务活动的“外部化”过程,在市场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分工迅速发展,促成了现代服务经济的实现和发展。最后,企业在区域间的功能活动分工状态及其所形成的中间需求力量差异,会促使区域间产业结构转型及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发展的过程形成差异,是部分地区率先从制造经济发展到服务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相对地,也是另一部分地区相对缓慢地进入这一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样的,在产业链层面上,产业链环节的区域间分工同样会因为其分工的状态及其所形成的中间需求力量差异而对制造经济到服务经济的发展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在战后迅速地发展出服务经济形态,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快速而有效的工业产业分工深化和演进,还因为其所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对相应的服务活动具有更强的中间需求推动力,因此在这些国家,制造经济本身可以内生地推动服务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五,在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分析中,本书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并对其向服务经济发展的道路进行了展望。我们通过各种实证分析方法,肯定了工业产业的分工发展确实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分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了不利的抑制作用。而当将这一分析放置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背景下时,我们发现也印证了产业的区域间分工差异确实会对不同地区的服务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不

同的影响,它在促成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形成的同时,成为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推进服务经济进程的一大阻碍。这些结论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为何未能与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水平相符合的原因。

## 10.2 政策含义

在中国仍处于高速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今天,可能人们会认为去考虑和研究迈向服务经济阶段的过程还为时过早,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还是过多地将产业结构变动发展这一经济现象的意义单一化,且存在着对“人均收入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线性关系”的迷恋和局限,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增长,产业结构自然地会调整和升级。而本书的研究强调指出了人均收入最多只是在最终需求的意义上对产业结构变动升级的过程产生比较宽泛的阶段性的影响,而对于这个过程中具体的形成机制和各种千差万别的产业结构形态而言,这个最终需求因素的解释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过程的形成机制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外在结构表现的问题,它还牵涉和反映了社会生产内在的增长机制问题,反映了各个产业之间内在的关联和互动,它不仅会影响产业结构最终的形态,还会影响经济的增长效率。因此,从最终需求因素之外的、更能反映产业间内在关联和作用机制的中间需求因素——分工深化与拓展——出发去研究产业结构的变迁,不仅可以使得我们对从制造经济迈向服务经济的转型过程有更为深入和细致的了解和更准确的展望,而且对中国经济今后发展道路的具体实践是很有意义的。鉴于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工业化粗放式增长的问题,从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内生互动机制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和展望今后的结构发展道路,更加显得具有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书通过研究已经发现在工业化阶段,以及从工业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中间需求性质的各类生产型服务的主

导性增长是其最主要的和根本的特征,这一点有力地说明以分工为代表的中间需求因素是推动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促使我们今后应更多地从这个层面上去看待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动发展以及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探寻我们产业结构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在通过对各种分工形式及其深化拓展过程对服务经济进程所起的影响机制的分析论证中,本书强调指出产业内分工的细化和深化,会直接导致中间需求力量的迅速扩张,这反过来又会刺激分工环节的不断延伸和拓展,从而再次形成内部中间需求的张力,循环往复,由分工所引起的这一系列中间需求力量的变化是引起产业或行业间结构变动的最根本的机理,从而也是推动服务经济从制造经济体系中内生地扩张和发展的最根本机制。因此,所有会促进产业分工深化和细化的因素同时也会促使服务经济的有效增长。例如,由于市场壁垒的消除所导致的市场和生产规模的扩张,会进一步促使产业分工环节的延伸和扩张;市场交易效率的演进提高,会促使服务活动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从制造经济体系中分离而出,实现自身的独立增长等等。这告诉我们,高速的工业化过程如若不能带来相应的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不能促进服务经济从制造经济中内生地得到发展的话,那应该是这个经济体中的产业特别是工业产业分工体系内部出现了障碍和问题。例如工业企业制度改革、市场化制度改革的不完善,会导致工业企业内部无法形成更细致的分工和更高的专业化水平,会导致市场交易效率低下、服务活动外部化过程受到阻碍,这些妨碍中间需求力量不断扩张的问题,最终将带来服务经济的滞后发展,也同时影响到了工业化经济增长机制的健康发展。在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了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工业对服务业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一种挤压和抑制的现象。制度上的缺陷使得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仅仅对服务业发展产生极其微弱的影响,而地区自身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因地区之间壁垒的存在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滞后,还并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服务交易的发展,以及区域体系内服务经济梯度式

的演进发展。这些发现都促使我们从改善工业产业分工效率的本身去寻求发展服务经济的道路。

当我们考虑到区域间产业结构发展进程的差异时,我们研究和论证了地区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和跨地区交易市场间的融合,会导致企业或产业更多地采取跨区域的结构分工分置。这种分工及其所产生的中间需求力量差异,会最终导致不同地区从制造经济迈向服务经济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速度和进程。这很典型地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庞大的资本网络所建立起来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对其自身以及对这一分工体系的其他环节地位的国家 and 地区服务经济发展进程的不同影响作用上。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于这种初始的禀赋优势和分工的高端地位,对服务经济发展产生了良性的循环刺激作用,从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到服务经济阶段,享有着最丰厚的经济发展财富,而相较之下,处于其相对一方的发展中国家却因为长期停留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片断,失去对整个产业的控制力,从而也失去了对中间服务的需求推动力,形成了服务业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工业化增长和收入水平增长滞后的现象。中国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体现。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很赫地发现 FDI 的急速增长和扩张,在促进中国工业化增长的同时,对服务业发展根本没有任何积极地影响作用,在某些时候甚至还有负面效应,它说明以 FDI 为代表的中国国际产业分工状态对服务业发展没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长期的打工经济和对自身技术进步和禀赋提高的忽视,使得中国长期扮演着“制造工厂”的角色,收取微薄的打工利润。由于没有通过改善禀赋条件和技术水平积极向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上升,又缺乏网络控制性的中间生产服务,这种长期的低水平分工状态必将导致工业化福利大量流失、工业增长机制乏力,以及最终服务经济的发展缓慢。虽然这一分工体系的形成是一种客观因素影响下的存在,但我们未能积极有效地实现产业链升级,满足于打工经济所带来的表面“数字”繁荣,是这种分工体系持续存在的和产生不良影响的重要原因。

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已开始强调“服务经济”的重要性,这是国

家宏观政策从产业导向向功能导向转变的标志,它认识到了服务业发展不仅仅是产业结构外在的变动表现,它还牵涉到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和中国经济今后的健康发展。如果中国希望保持持续的增长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并为将来迈向服务经济阶段奠定良好的基础,就必须要使“制造”和“服务”形成整体的互动和协调发展,以工业化带动服务业特别是具有中间需求性质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加速发展。由此我们提出如下一些政策性建议:

首先,从进一步促进工业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出发,促进工业产业链结构升级,促进产业分工深化,以及服务活动的外部化和专业化,改变产业单一和片断化的生产分工方式。多元的、各种高级形态的分工形式将促成服务业从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实现内生增长。

其次,继续努力推进市场化进程,进行制度改革,降低区域间行政壁垒,实现市场交易效率的改善,促进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为统一市场的形成、区域间分工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业的集聚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

其三,在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同时,积极改善和提高自身的禀赋优势,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努力实现工业产业链结构升级,提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促进自身产业链的分工深化和拓展,从而对自身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性的刺激和推动。

最后,通过服务业的扩大对外开放、区域间的分工合作体系实现生产型服务的快速发展。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虽然在短期内会对本国服务产业造成一定的挤压,但却可以更好地引进专业化的服务人才和技术,促进业内竞争。CEPA 的实施是这一开放过程的试水之举,通过与香港的广泛密切合作,促成专业化服务人才和技术的充分流动,带动中国生产型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在开放的同时,中国城市和地区之间也应走向广泛密切的分工合作,服务基础好的城市和地区,在保持自身制造业高端环节的技术优势和控制力的基础上,应通过逐渐打破行政壁垒的方式,一方面实现部分制造业的转移,一方面为周边其他城市提供先进的生产服务。这同样可以从香港这样的城市通过与中国大陆广大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动中得

到借鉴,也是诸如长三角中的上海与周边地区、珠三角的深圳、广州与周边地区所面临的发展路径。

### 10.3 未来研究的展望

首先,本书从分工和中间需求的角度出发比较系统地研究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发展过程的具体机制,但是仍无法穷尽所有的、各种的分工状态表现及其对服务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而且还未能建立一个更为体系化的、内恰而完整的理论框架在更为严格的动态基础上来研究和涵盖这一命题,以及体现分工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动态循环的互动影响关系和机制。这是本文研究的不足,也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其次,由于具体数据的缺乏,未能在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样本基础上进行更严格的计量实证分析,在今后应努力搜集和建立更为完善的数据库,对各种分工现象对服务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做出更严格和详细的实证分析。

第三,仍然是由于具体数据的缺乏,在对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计量实证分析中仍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今后将努力建立如企业之类的更微观层面上的数据库基础,对此研究问题做出更详尽和令人信服的实证分析。

第四,今后的研究中还要注意计量实证分析时各衡量指标代表的准确性,以及指标体系内部的相容性,这一点同时也是建立在对第一点的完善基础之上的。

最后,今后在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应继续关注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结构问题与经济增长的效率及福利问题进行更深刻的剖析,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中更多的困惑,并为其提供更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意见与建议。